

纪宝成 著

中国教育家文存

教育家文存

纪宝成 卷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理应对全人类的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也确实不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了丰富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改革成就和新时代的教育家。一大批教育专家学者上下求索，呕心沥血，为教育改革殚精竭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直接推动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并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为了记载历史、研究现实、把握未来，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教育家文存》。能够真实记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生动呈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为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提供经验，为教育研究的新思考提供滋养，推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中国教育家文存》能够真实记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生动呈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为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提供经验，为教育研究的新思考提供滋养，推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纪宝成 著

中國當代
教育家文存

教育家文存

纪宝成卷

[illegibl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 纪宝成卷 / 袁振国主编; 纪宝成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5617-4518-4
I. 中... II. ①袁... ②纪... III. 高等教育—中国—文集 IV. 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182 号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 纪宝成卷

著 者 纪宝成
策 划 朱杰人
责任编辑 吴法源 李永梅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23.5
插 页 6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7-5617-4518-4/G · 2628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作者简介

纪宝成，1944年11月生，江苏扬州人。1966年于北京商学院本科毕业，198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副教授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司长，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等，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并被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20余所国内外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或聘为兼职教授。

出版《商业活动论》、《商品流通论》、《市场营销学教程》、《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岁月诗痕》等专著，主编、参编著作20余本，在《人民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纪宝成卷》	纪宝成 著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	杨福家 著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周远清卷》	周远清 著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潘懋元卷》	潘懋元 著



纪宝成先生近影

丛书主编

袁振国

丛书 序言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理应对全人类的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也确实不断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改革成就和新时代的教育家。我国一大批教育专家学者上下求索、大胆实践，为教育发展出谋划策，为教育改革殚精竭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直接推动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并将对今后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为了记载历史、研究现实、把握未来，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希望《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能够真实记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生动呈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为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提供经验，为教育研究的新思考提供滋养，推动教育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编者

2005年10月

代前言

纪宝成 教授
访谈录

袁振国教授（以下简称袁）：纪校长，您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首先请您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做一个总体的回顾、勾勒和评论。

纪宝成教授（以下简称纪）：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塑造未来的事业，对一个人来讲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讲更是如此。我们中国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我看历朝历代对教育都很重视。应该说，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内忧外患、战乱不断，那时教育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非常零散、残破不堪，规模也很小。只有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才能接受高等教育。那时只有11万多在校的大学生。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从西方引进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时期，但发展极其缓慢。

高等教育的真正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给予极高的评价，不过这里也有很多艰难、有很多挫折。总体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就非常巨大。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对整个国家的破坏，而且“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大革文化命，首先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开始，教育是重灾区。除了这10年“文革”以外——其他的年代里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大跃进等等，但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成就巨大。没有建国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绩。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我估计有3000多万人。如果没有这3000多万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有这么大成就吗？完全不可能！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怎么估计我认为都是不过分的。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政界、军界、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科技界，现在这些领域的骨干力量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没有这群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难以想象的。改革开放连外语都不懂，能改革开放吗？引进的设备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行吗？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的贡献，对民族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民族进步、国家发展本身的需要，是内在的需要，它并不是外在的东西，它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体的。

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次是“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重新重视教育，排除左的干扰。“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变动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它既是拨乱反正的阶段，同时也是为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打基础的阶段。第二次大的变革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教育观念的更新。这10年改革是高等教育历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没有管理体制的调整，打破条块分割，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没有后来的发展。所以说这次改革是更深刻的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解决好高等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也包括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后勤社会化等这些改革，特别是把部门办学的问题给解决了，形成了现在中央和地方两级办学的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彻底摆脱了部门办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所有这些改革就为1999年以后的扩招——数量上的跨越式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组织上的基础。没有改革就不能想象会有这个扩招。所以这10年是体制、制度上重大创新的阶段，体制改革意味着制度创新。中国高等教育因为制度创新，实现了快速的发展，迅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当然提“满足”这个词要谨慎一点，这是相对当时的情况来提的，当时中国广大的老百姓能够上大学太难了。再比如说，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学科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运行机制有了很大的变化，教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总体上讲，这次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一、酝酿阶段，从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到1992年，这主要是思

想上的酝酿、观念上的变革以及实践当中的零星探索。二、探索阶段，从1992年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主要是探索思路、积累经验、制定政策，提出了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要求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三、全面推进阶段，1998年1月贯彻党的十五大有关精神的扬州会议后，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此后便是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这次扩招一举实现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成就。但是现在看来，这次连续扩大招生，没想到连续扩大了5年，这个我是不太赞成的。当时在连续大幅度扩大招生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有想法了。第一年我觉得没大问题，第二年搞得好也没有太大问题，第三年再这么大幅度扩大招生，我就有想法了。但是在我们国家，一阵风潮来了以后，往往挡都挡不住。这个问题可能跟我们的传统思想方式也有关，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提倡“中庸之道”呢？为什么孔夫子会提出“过犹不及”？这是因为中国人好走极端，这可能是我们民族性中的负面的东西，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所以从古至今都强调“中庸”，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强调“度”，你要达到合适的“度”，你不要超过这个“度”。而中国人老是把自己推向极端以后，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扩招似乎也是如此。当然事情往往都是在挫折中发展的，有了些问题我认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怎么认识问题、怎么对待问题。我个人对高等教育是非常热爱的，而且我也丝毫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身在教育就说教育贡献大。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竞争能力的大小，人才是最重要的，而要培养人才是不可能没有高等教育的，哪怕是自学成才，最后也是自学高等教育。完全靠自学的人才是有，但极其罕见。大量的人才靠学校，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培养出来的。我很遗憾的是，我们高等教育还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基本的表现就是投入不足。我们现在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才3%多一点点，至今也没有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4%这个目标，实在说不过去；说老实话，前些年2%多一点的时候，那还是非洲落后国家的水平啊。高等教育就更是这样，整个教育经费当中，用于高等教育的原来有19%—20%，现在是21%—22%，有没有？

袁：差不多，或稍多一点。

纪：美国的高等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重是25%以上，它的教

育经费占GDP的6%—7%！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教育上存在的有些问题，被过于夸大了。原因也找得不很准。教育这件事情，因为人人都要受教育，所以人人都是教育家，至少人人都是教育评论家。不像科技技术，太专门的老百姓不太知道，没有人评价科技部。因为谁家的孩子都要上学，而一般人都受过教育，至少受过小学教育，所以谁都可以说教育这儿不对那儿不对。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对教育也可能不够公道。例如，现在查学校乱收费，我认为首先要查、至少同时要查政府为什么不按规定支出教育经费，政府的预算支出是否合理，为什么对教育不按照国家规定来投入。如果一所学校的校长，从政府得到的钱太少，为了维持学校最起码的运转才迫不得已收费，难道就没有值得社会反思的地方吗？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应该表扬他、肯定他？他把这个学校维持下来了，维持一所小学校就维持了一二百、二三百个学生，就帮助了几百个家庭，这个校长应该受到表扬呢，还是应该受到批评？当然，如果收的费额外地进入了个人腰包，那当然是要查办的。我关于教育的思考很多是教育宏观管理、教育政策方面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国家的教育能够健康地发展。成就大不等于不出现问题，如果我们对存在的问题不能够认真对待的话，我们将不能健康发展。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观念、教育方针，就是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个非常值得研究。德育与智育相比，德育受到了削弱；我们对德育的理解，也是非常狭隘的，过多地偏于政治层面的理解，道德层面、做人层面受到了严重的忽视。怎么把德育的内涵搞丰富，怎样在德育上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大问题。怎么敬业、怎么做人、怎么尊重他人，这些东西都要从小培养，否则构建和谐的社会就很困难了。我记得朱总理在当总理的时候讲了几个关系：德育与智育，要更加重视德育；数量与质量，要更加重视质量；改革与发展，要更加重视改革。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现在还是要强调。我认为现在智育、智商已经深入骨髓了，比如高考录取所谓透明度问题。我那天跟学生司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不能太强调一分一分地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不能太过分强调吧？他比我高一分就录取他，录取低一分的就成了不正之风，这哪里还有学校自主权？要是这样就不要学校招生了，招办直接分配就是了。这个上北大，那个上清华，这个上人大，那不就完了吗？根本没一点点余地让你综合考查学生，说我看他在中学做班干部怎么样，操行品德如何，专业特长如何，学科结构怎

么样。这些现在都不管了，只看分数，在堂而皇之的透明度下彻底剥夺了学校的学术自主权。我认为，最起码，在一定分数段之内，完全应该由学校决定录取谁。现在太强调总分数。这个学生总分高一分，这个学生素质就一定好于低一分的？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现在教育思想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很可怕。这根本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与提倡素质教育很不协调。

教育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教育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样保证教育公平，这完全是新课题。我认为我们现在对这个研究不够，对各种存在的现象认识不够。我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应该建立两个体系：一个普通教育体系，一个职业教育体系。现在高等教育差异化程度，远比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大多了，越来越大。好学校，资源、财力等各方面都很集中；差一点学校，原来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现在差距越来越大。这个究竟是必然的呢，还是我们的某种政策出了问题？而且是越改革，差距越大。这究竟是符合规律的呢，还是改革的导向出了差错？前两年去了台湾，我觉得基础教育有些地方可以借鉴台湾的一些做法。台湾的小学，它叫“国小”，走到哪个“国小”，教学都差不多，样子都差不多，一看就是“国小”。“国中”也是如此，一看就是“国中”。城市乡村都差不多。但是在大陆，不管是哪一级，小学、中学、大学，校级之间差异越来越大，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就从这点看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现在非常突出。当然怎么理解教育公平，什么叫教育公平，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目前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我个人认为是很严重的。

除了这三大问题以外，我认为对国民教育来讲，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是极大的理论误区。教育培训我是从来主张市场化的，培训除了党校以外，其他培训几乎都可以搞市场化。但是国民教育，不仅仅是基础教育不能产业化，高等教育也不能产业化。目前有些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观点，是一个极大的理论误区，它的实际后果会导致很多地方政府对教育增量部分不愿意承担财政责任，实际上它成为地方政府不愿意增加教育投入的挡箭牌。这个理论影响太大了。把不适当的市场关系引入到高校内部，高校人才市场怎么竞争？完全企业化竞争是不行的，因为教育是某种公共产品。既然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就应主要由或相当程度地由公共财政来支持；既然财政由公共财政支持，就应实行科学的公共管理；既然是公共管理，就必须遵守公共规则，所以你的自由是有限的。把教育看成商品货币

关系、金钱利益关系，不加分析地把市场化引入学校，危险非常大，危害非常大。

我思考的教育上的几个问题，前面三个，再加一点：理论误区。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会能更健康地发展。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教育，要在教育上多投入。把教育方针、教育理论搞得更好，把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好，根除错误理论的干扰，那么我们中国教育就可以发展得更好。我们讲国家的强大依靠自主创新，持续的自主创新来自于教育。教育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我希望更多的人理解这一点，不能急功近利。教育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有远见的政治家，从来都是十分重视教育的。你看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肯定讲到教育问题。我们国家领导人、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千年大计，教育为本”也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等提法也好，我觉得对教育重要性的表达完全够了，现在重要的是政策、是措施、是行动。

作为教育战线的工作者，我们一定要自律。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思考怎样为人师表，怎样传道、授业、解惑；我们的师资队伍，教育战线的领导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要用经师与人师的统一来要求自己。你不能只做传授知识的经师，还要做为人师表的人师，你要热爱自己的学生。我认为一个老师不热爱自己的学生，这样的人就应当离开教师队伍。现在的老师有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高校里面，而是在外面搞个人盈利性活动，甚至让研究生为他自己打工赚钱，这样的人还能当老师吗？所以我们希望教育部出台一些政策，规范教师的行为，而不是一般的倡导，要有硬的措施，动真格，进行严格的管理，把队伍建设好。我觉得在我们教育战线，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你自己都不会做人，怎么培养人？现在师资队伍建设，我认为对业务、技能重视得比较多一些，而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在为人师表方面，要求得不够，或者抓得不够。当然这里有不少的问题，比如我们怎样发掘人才，怎样进一步重视优秀人才的成长，怎样规范人才流动等等，这就涉及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制度的改革。

袁：下面这个问题，不知是否合适。您以前是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司长，曾长期从事全国教育发展规划工作，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当时可能也有很多学校对您的工作方式、工作思路有些不同想法。您现在是中国人

民大学的校长。这几年人民大学的发展引人注目。您在这个角色转换过程中，也可能感觉到工作中的一些困难、矛盾、冲突，包括与上级行政部门的矛盾、冲突。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这种说法，现在是“纪校长反对纪司长”？我想就这个问题，请您谈谈这个角色转换以后的感受和想法。

纪：“纪校长反对纪司长”，这是一句笑话，是一位大学校长开玩笑说的。我认为“纪校长”和“纪司长”本质上是一致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做司长的时候，考虑全国的问题多一些，作为发展规划司，制订规章制度、发展规划主要是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发展规划司主要负责教育规划、管理体制、高校设置、年度招生计划、高校办学条件、直属高校基建等，和高校关系并不太直接。在这些方面，到现在我还没看出来“纪校长”是反对“纪司长”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我觉得它反映了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状况，这个矛盾怎么才能解决得更好一点，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如何支持重点学校发展，我在部里工作时曾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即首先根据博士点多少来加强资助，每个博士点资助多少钱，这体现了某种公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拿出一些钱用于专项来资助“重中之重”。这样，博士点多的受资助就多，而重点高校肯定博士点多，这就支持了重点高校；而“重中之重”的，还可以得到一笔额外的资助。我现在依然是这个观点。我认为按标准拨款是法治，搞专项安排，很有可能搞成人治。现在专项项目太多，要下面申报的太多，评审的太多，需要评审的项目那么多，也就牺牲了学校的学术自由权。其实，人家会用心搞，不需要你在教学科研项目方面规定得太具体，不需要你来审批那么多具体科研项目，有多少诺贝尔奖是事先规划出来的？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你看耶鲁大学，它不会对教授说，你必须搞出什么东西，但是教授都会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认真研究，这个观点，我认为我是一致的。问题在哪呢？作为一个校长来讲，我要关心全面的工作；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我只是在一个领域工作，在这个领域里跟我有关系，不在这个领域跟我就没直接关系。当然做了司长再做校长，可能更有利于沟通。有时我们也会替教育部想一想，想想教育部的难处在哪，还能理解教育部的难处。我知道政府的运作方式，有些事情根本不是教育部的事情，教育部也没办法。但是在学校里，有时候确实也能看出政府部门的工作哪些是好的，哪些可能与基层实际不大适应。如果把“纪司长”说成一个泛化的司长，把“纪校

长”也泛化成一个校长，那确实也可能反映一些问题。这个“纪校长”反对“纪司长”，也可能存在。因为我可能会把上面影响学校发展的问题提出来，你哪里管得有问题我要给你提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能有“纪校长”反对“纪司长”。当然，众所周知，我当司长时，坚决反对国民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反对“一校两制”，坚持最基本的办学条件，这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并没有发生“纪校长”反对“纪司长”。所以“纪校长”很多时候都是赞同“纪司长”的，哈哈！

袁：您是一位学者，到了教育部门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工作，现在您在领导学校的学术繁荣和学术发展，您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管理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纪：我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以后重点抓的工作之一即呼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这对学校的发展很重要，因为人民大学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我认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从外部环境来说，第一是领导重视，而且认识要到位，这是最重要的。领导认识到位也要有具体表现，最重要的有几个环节：一个是经费投入，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不能把哲学社会科学看成仅仅是一支笔、一杯茶，这种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实际。另一个就是克服、解决制度性的歧视。所谓制度性的歧视，就是自然科学有，哲学社会科学没有的一些制度性设计。这个问题不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科技上有三大国家奖，这是一种制度；哲学社会科学有什么国家奖？一个奖也没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有院士，这是一种制度；哲学社会科学有吗？也没有！院士地位挺高，出差都是副部级待遇，有住房等各种各样的待遇。这样，从孩子开始就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不行，自然科学好。我希望最起码教育部要建立类似于院士的人文社会科学制度，比如资深教授，与院士同等待遇。再一个就是在国家发展规划等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也要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一样纳入议事工程，放在同等重要地位。

第二，宏观上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四个尊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体现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是要真正贯彻“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自由。坚持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坚决一定要”：坚决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决一定要贯彻“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方针；坚决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样就把学术自由的环境创造出来了。只要是遵守宪法的，任何学术观点都可以存在，否则就没有创新。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创新。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环境比原来要好得多了，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我认为影响学术自由往往来自三个方面不适当的做法：一是政界人士不适当的干预，二是学校不恰当的规章制度，三是学术权威不适当的行为。要务实地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才能营造并保持健康的学术环境，才能真正达到“会中外学术有容乃大，凝古今正气无欲则刚”的境界。所以，我认为创造学术自由的环境，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学术机构的事，我们所有的学者，都要尊重学术自由。

从微观这一块来看，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机构和工作者本身要做的工作。我觉得这一块也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如果你自己不争气，你自己不努力，宏观环境再好也没用。

首先是队伍，要有一支非常好的、精良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者队伍，就是我前面讲的，道德文章堪为师表，经师与人师的统一。

第二你一定要有贡献，有为才能有位，你一定要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战略性的、基础性的、前瞻性的、前沿性研究或者整理国故等等。这次《黄宗羲全集》的出版，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非常感人，这充分显示整理国故同样会受到重视。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拿出研究成果来，才能有位。

第三个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这个开放的心态是什么呢？小而言之，你不能占山为王；大而言之，你不能把理论与实践隔离开来，自吹自擂，一定要尊重实践，一定要深入实践，从实践当中总结，更宏观一点，你不能够仅仅看到我们国内，还要看到国外整个哲学社会领域的前沿，努力去了解它、消化它，该吸收的吸收，该借鉴的借鉴，该划清界限的就划清界限，该抛弃的就抛弃。还有一个，就是学科的开放。哲学社会科学考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考虑人文科学，法学院考虑经济学，这种学科的交叉融合非常重要。我们没有这种开放的心态，没有这几个层面的开放，哲学社会科学就很难繁荣和发展起来。

第四个方面，学校机构本身的各种规章制度要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发